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有这样一座城，它依山傍水、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有这样一条江，它蜿蜒东流、波澜壮阔，滋养了无数生灵，也见证了无数文明的兴衰更迭。这座城市，是武汉；这条江，是长江。

多年前，曾采访一位城市环境研究专家。他的一句话让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有了全新的认识——“武汉有山有水有湖，是一座最适合生活的城市”。在此之前，在我的认知里，这座城江河纵横、湖港交织，它是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被誉为“天下四聚”之一，有着“九省通衢”之称；滚滚长江穿城而过，才有了“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万里长江横

渡，极目楚天舒”的名句……武汉，我出生生活的城市；长江，哺育我长大的母亲河，我爱它们，是璀璨、宏大、抽象的地理概念和情感依托。

这种抽象的情感认知因作家林东林的报告文学《江城人护江记》而变得具象。在他的文字里，这座城的“护江者”们——江滩建设者、专家学者、护鱼员、志愿者……用他们执着而平凡的努力，诠释了他们对这座城、这条江深沉的爱。年过七旬的志愿者肖桂香因为“对长江有感情”“一直生活在这个地方”，所以“不让任何一份垃圾污染长江”。

(周璐)

主编：周璐 美编：陈昌 版式：邱巍 责校：毛欣

江城人护江记

□林东林



关于长江的每个字词

之前，在九江，在上海，在安庆，在南京，在宜昌，在重庆，在我以游客身份出现在的长江流经的那些城市，长江于我仅仅只是作为一种景观性的存在，刚刚出现在眼前，旋即又消失于眼前；之后，在武汉，在我生活了10年的这座城市，长江虽然流经于此，虽然构成了这座城市的版图、格局、形象和气质，但于我也仅仅只是作为一种背景性的存在，最多也只是作为我在日常交通和地理方位上的一项参照以及带领外地游客参观的打卡点，而并不会与我的日常生活建立起深度相关性。

当我开始进入武汉“长江大保护”为主题的创作后，我对长江有了新的认知。半年多的时间里，我面对面地采访了各个领域的“护江者”，从护鱼员到志愿者，从专家学者到宣讲员，从人大代表到救援队员——我希望采用非虚构写作的方式，尽力以他们的视角和事迹还原一条江和一座城的纪事，呈现出武汉和它的子民们为保护长江所作出的平凡而又壮阔的努力。

事实上，正是因为他们不断接触，我才知道在武汉还有一群与长江和保护长江关系极为密切的人，才知道与长江有关的那些我之前无从知晓的种种内容——禁渔、上岸、指标、治污、规划、管理、建设、研究、传播、展示、环境、物种、生态、流域……这些内容甚至可以无穷无尽地列举下去。

应该承认的是，他们每一个人——即使是江滩上那些捡拾垃圾的无名志愿者和宣讲员——所从事的，几乎都为我填补了这样领域的空白和盲点。

是的，我意识到，我对长江的关注和了解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那种形而上脱离了它的所有现实内容，指向于一种文学化、浪漫化和修辞化的想象；而他们却完全不同，在他们那里长江是形而下层面的，是可见可及的，是具体而微的，它有着某种具体确定的内容和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他们——这些参与着保护长江的人们，才校正了我——当然也包括跟我一样的人——对长江的认识，他们给我带来了一场关于长江的“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让我重新收获了一条长江——一条与我之前认识的完全不同的长江。

这趟田野调查式的创作旅程，把一条现实意义上的长江切实内化在了我的感受和记忆之中，它既不虚蹈，也不凌空，而是以一种扑面而来 and 所见即所得的方式压实了我的长江认知中那些过于文学化、浪漫化和修辞化的部分。而且我也坚信，这样的认知改变对于我——以及像我一样的写作者来说，其实是一件特别有助益的事情，它让我写下关于长江的每个句子、每个字词甚至每个标点符号都更加结实——就像从土地里长出来的。

中，这当然应该感谢20多年来的江滩建设者们——而对傅先武以及像他一样的参与者，这或许也可以算是后来的他们所赠送给以前的他们的一份礼物。

不，在横渡长江博物馆楼顶的这个江滩制高点，在他们参与建设过的这片江滩上，我见到的并不仅仅是后来的他们赠送给以前的他们的一份礼物，那也是他们赠送给所有在江滩上重新看见长江的人的一份礼物。没有夕阳，没有晚霞，我用手机为傅先武和他的同事们留下了一张背景是对岸城市天际线的合影——我想用这样的方式为他们留下一份与长江的纪念，留下一份与汉口江滩的纪念。

水质检测的工作，实现了我的梦想

六月初的一个下午，在跟王琼通完电话之后，我来到武汉水务集团宗关水厂，她的助理将我带到一栋老楼顶层的办公室。王琼在这里办公，但是，她并不在办公室——这位全国人大代表、宗关水厂的总工程师，正在隔壁接受着另外一个采访。

十几分钟后，一位穿着浅蓝色套裙、烫着大波浪发型的女士进来了——我马上就意识到，眼前的这位就是王琼了。她微笑着坐下来，连声说抱歉。

自1995年进入宗关水厂担任一名基层水质化验工开始，到现在成为全省知名的水质检验能手，王琼先后获得了一系列荣誉——技术能手、技能大师、劳动模范、荆楚工匠、大城工匠、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武汉工匠等等。这几十项荣誉，既是她在这座百年水厂度过的29年时光的收获，同时也记录着她作为一名水质检验工作者的一个节点。

如果把29年再拉长一些，拉长到进入宗关水厂之前，王琼其实也一直都在这里——事实上她就是这座水厂的子弟。她提起了小时候在这座水厂里经常可以看到的那似乎带有预示性的一幕——“当时在水厂里也看不到其他人，看到最多的就是水质化验人员，他们经常穿着白大褂拎着篮子，里面装着一些瓶瓶罐罐——因为原来没有在线仪表，需要每一两个小时拎着水瓶去取水样检测，当然现在已经不需要。我对这些穿着白大褂的人很感兴趣，觉得这份工作很神秘。”

初中毕业后，王琼去读了当时的自来水技校，学的水泵专业。毕业后就选择了这个岗位，直到今天还在做这份工作。

就针对长江水生态和江豚保护做了一些调研。”

2023年，在当选为湖北省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次参加全国“两会”时，王琼就提交了《在湖北武汉建设“数字江豚”平台，让江豚成为长江大保护的国家名片》的议案，提出为濒危物种保护积极探索数字化路径，以数字科技助力长江大保护、打造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样本”——在她看来，这一项目的重要性在于，不单是践行长江大保护战略的一项重要载体，也能提升“十年禁渔”的质效，同时还能对武汉的城市形象进行活化表述和传播。

“据我观察，如今长江水域生态环境呈现出持续向好的发展趋势。”王琼说，近年来长江武汉段的一系列水质指标，清晰地显示出长江武汉段的水质持续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Ⅱ类水体要求，如今江豚种群数量也在逐渐恢复之中，武汉段的长江江面上经常出现它们的身影。对王琼来说，那样的身影就是长江水质变化最直观的体现——“每当看到江豚频繁出现在武汉江段时，作为一名水安全守护者，我总是感到十分自豪，我认为这是大自然对长江水生态环境持续变好的生动回答。”

而长江水生态质量改善的另一个直接证明，则来自2023年2月农业农村部公布的2022年长江江豚科学考察结果——这个结果显示，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为1249头，第一次实现了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止跌回升。在王琼看来，她的工作也有了新方向，“这个考察结果更直接地反映了长江流域水生态的持续好转，长江大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所以在这一年的履职工作调研中，我特别注意到一个新课题——是时候让迁地保护的江豚回家了。”

在一年之后的全国“两会”上，王琼又提出了《关于将迁地保护江豚适时放归长江，促进野外种群快速恢复》的议案。在她看来，不论从长江水域生态环境的持续恢复、迁地保护江豚群体的快速恢复还是从野化放归的训练经验来看，现在进行迁地保护江豚的野化放归正当时，这不但是贯彻长江大保护决策的必然要求和关键步骤，更是长江大保护成果的直接证据。为此她还提出了《实施“迁地保护长江江豚野化放归国家工程”》的建议——编制和发布国家层面的工程方案，倡导增建训练基地，加大对迁地保护江豚野化放归监测技术研究。

在与王琼聊着这些的同时，我想起她提到曾喜欢席慕蓉、汪国真的诗歌——当年，喜欢文学的她，本来是要继续考高中、读大学的。我问道，当年没有读高中、考大学，现在有过后悔吗？她笑着纠正了我的用词——“也不能说是后悔，所谓的后悔可能就是有点儿遗憾吧，还没有到后悔的程度。”

走出宗关水厂大门的时候，我停下，回头，又想起王琼的话。一条道路和另一条道路，一种得到的和一种失去的，也许是一种遗憾，当然，从事水质检测以及后来对于长江大保护的种种参与，也可以是她实现的梦想的另一形式吧。

护鱼人：我以前打鱼，现在护鱼，子孙会为我骄傲

与武汉经开区护鱼员陈贤铭的见面地点是在军山大桥底下。我跟他确认道：“就是在军山大桥底下吗？”他在那头说：“是的，我们又没有办公室。”

第二天上午9时多，我一眼就认出了军山大桥下的陈贤铭——他穿了一件醒目的护鱼员服装，旁边停放着一辆喷涂有“禁渔巡护”字样的新大洲牌电动车——车把上斜挂着一只已经脱了线的草帽。我们走下堤坝，穿过一段滩涂来到江边。刚才走下来的一名垂钓者就坐在距离我们几步之外的地方，他向我们诉苦道——“钓不到什么大鱼，只能钓钓‘船钉’”。

不过，在陈贤铭看来，“船钉”多了其实也正是长江生态逐渐变好的直接证据：“‘船钉’多了，说明长江的生态恢复得相当好了，以前，长江没有实施禁渔的时候，有好多电船、迷魂阵、绝户笼，搞得很凶，生态破坏得很厉害，‘船钉’并不多见，现在生态治理了，‘船钉’也多了起来，而且江豚——就是江猪子——也出来了，还有长江鱼（又叫金秋鱼），它们主要是贪食‘船钉’一类的小鱼，它们能够游上来恢复觅食，也就是说明生态恢复得相当好了。”

之所以会对长江那么熟悉，是因为陈贤铭曾经是一名职业渔民，家住长江边军山街道军江村里的他，13岁就开始跟着父亲捕鱼。

“我捕鱼有四十多年了，我们家里原来有两条船，也就是母子船，大船有十几米，用的是12匹马力柴油机，小船用的就是6匹马力的机子，距离远的时候就开大船，不好上岸的时候就用小船。”陈贤铭还记得，在起初的那些年里，捕鱼确实还能算得上一条能养家糊口的门路，“那时候鱼类资源还比较丰富，几乎每次出船都有上百斤鱼获，四大家鱼基本上都能捕到，大的鲤鱼有四五十斤，大的鳊鱼甚至有七八十斤。但是后来，随着过度捕捞和生态环境的逐渐恶化，长江里的鱼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小，即使起早贪黑，连二三十斤鱼都很难捕到，根本养不活人。”

作为一名靠捕鱼为生的职业渔民，陈贤铭当时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生存选择的境地——是捕还是不捕？直到2020年7月，国家出台了长江流域十年禁渔的政策。听到这个消息，陈贤铭没有丝毫犹豫，二话不说就和村里的20多位渔民一起，主动上缴了两艘渔船和其他渔具，决定“洗脚上岸”——出去打工，去找其他能谋生的门路。

对于禁渔没有抗拒心理吗？我问道。陈贤铭叹了口气说：“这也是大势所趋，长江当时的生态环境太差了，根本就没有什么鱼嘛。”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以渔民身份跟长江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他，接下来却又换了一重身份继续跟长江打起了交道，“后来，农业农村部下了一个政策，就是安置再就业，于是村里就推荐了我们几个渔民做

护鱼员”。

“最起码现在可以不用待在水里了。我们以前常在水里面划，身体会患风湿等疾病，如果赶上天气不好，经常碰到有大风大浪，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现在做护鱼员，基本上就不用再划惊受怕了；而且我们一家五口人，两个子女都已经都工作了，在生活上基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有这么一份工作，我已经非常知足了，等到60岁还可以正常退休。”

作为护鱼员，陈贤铭每天的工作就是骑着电瓶车对长江小军山至汉南段十几公里的长江沿岸进行巡护——他每天上午8时出门，下午5时30分下班，上午和下午各跑一趟，一天下来要跑60多公里。“基本上风雨无阻，周末、节假日也照样，大家都休息的时候，反而我们的压力就来了，我们虽然也会有休息，有时候倒班休息，但是没有固定休息时间。”

“现在钓鱼爱好者也守规矩了，都是一人一杆一钱一钩，如果碰上违规的我们也会及时劝阻，我们有记录仪，如果劝阻一次两次不听，就记录下来交给渔政或者派出所。不过，违规的情况比较少见，现在长江大保护的宣传力度也比较大，大家也都有保护生态的意识了，我们主要是规劝钓鱼爱好者，一是不要在朋友圈里炫耀鱼获，二是不要买卖。”

在陈贤铭看来，现在长江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鱼类资源也越来越多了。“十年禁渔虽然才过去四年，但现在已经能看到效果了，有大船开过来的时候，就可以看见成群的鱼群跃出水面，还能看到江猪子在江面上跳，现在长江的鱼类资源相当丰富了，有时候甚至还会朝往来的船上跳，长江里的鱼，差不多相当于鱼塘里精养的鱼，成群结队的。”

在返回江堤的那段路上，陈贤铭又跟我说：“我今年55岁，到了长江禁渔的第十个年头，也就是2030年，我也该要退休了，到了那时候，我会带着孙子到江边来玩，跟他说说我从打鱼到护鱼的这段故事，到时候，长江里头的鱼肯定会越来越多了，生态环境也肯定会越来越好。”陈贤铭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我会跟我的孙子这样说，‘爷爷当年风光啊，从长江的鱼越来越少，到鱼类资源越来越丰富，我们护鱼员也做了贡献！’到了以后，我想我的孙子肯定也会跟自己的孙子去说，我们祖辈是怎么去保护长江、爱护生态的。”

采访结束之后，陈贤铭一边跟我挥手告别，一边又骑上他那辆新大洲牌电动车，沿着江堤巡护去了。而我则沿着与他相反的方向返回市区——从后视镜中，我看着他那件醒目的护鱼员越来越远，越来越小，直至最后消失不见。从军山大桥底下开出去之后，车子沿着南环线疾驰而行，右手边江滩上的树林被拖曳出一片白绿之光。望着那片白绿之光，我突然意识到，沿江的这一带其实也就是陈贤铭一天要跑两趟的地方——也就是他的“办公室”，它就立在那片白绿之光中，又或者，就立在长江边的这片天地之间。

江滩志愿者：我天天捡垃圾，不让一份垃圾污染长江

下午，细雨中，我站在汉口江滩三阳门外，见到了“爱在江滩”的两位志愿者肖桂香和吴翠云，她们俩都已年过七旬。

老家在武汉桥口的肖桂香，2018年加入“爱在江滩”阳光志愿服务队。成为志愿者之后，肖桂香有事没事总喜欢到江滩来走一走，看一看。除了在长江江边捡各种垃圾，她也会做一些引导游客、维护秩序的工作，有时候还帮残疾人抬一下轮椅，给游客带带路。多年来她在汉口江滩年均服务超过200小时，因为勤劳肯干、热情友好，她还被队员们推选成为了服务队六分队队长。

后来，在肖桂香的带动下，她的老伴、儿子、孙子也加入了“爱在江滩”阳光志愿服务队。除了参加净滩活动，他们一家三代人还经常参与汉口江滩组织的端午节包粽子、腊八送春联、关爱自闭症儿童等活动。2022年，央视电视台《一城好人》栏目知道他们家的事迹之后，还做过一期专题报道。

值得一提的是肖桂香9岁的小孙子潘福臣，这个育才小学的学生也是一名资深志愿者，每当爷爷奶奶到江滩，只要放假在家他也会跟过来，沿着江滩仔仔细细巡查，不放过每一个烟头和塑料瓶——仅2023年，他累计志愿服务时间也超过了200小时。

对于做一名志愿者，肖桂香归结于对长江的感情，“主要还是对长江有感情吧，有感情是因为一直生活在这个地方”。

与肖桂香年龄相差一岁的吴翠云，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个闲不住的人——“只要还走得动，我就要到江滩来”。她是这么说的，事实上也是这么做的，自从2019年成为志愿者之后，她一年甚至有超过330天都会来到汉口江滩开展志愿服务。她做得最多的是清洁工作，沿着长江捡烟头、垃圾袋、塑料瓶等，一捡就是好几个小时，不让任何一份垃圾污染长江——而因为她的积极、热情、吃苦耐劳，还被队员们推选成了四分队队长。

做志愿者不仅没有报酬，还要受委屈，吴翠云说：“一开始我们来做志愿者，有些人还不理解，觉得我们在作秀，我就跟他们讲，你不做，我不做，那环境靠谁来保护？不过现在强多了，市民游客也都靠自觉的，不再乱丢垃圾了，都蛮积极地支持我们的。”

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吴翠云说：“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吃的喝的都靠长江，长江大保护不是天天都在提唱嘛，我们大家都要共同维护。”“江滩是我家，美化靠大家”是吴翠云经常会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今年年初，她还拉着自己所在的“百子歌团队”，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的内容进行了改编，用群口快板的形式演给广大市民，呼吁大家行动起来保护长江，做好“长江卫士”。